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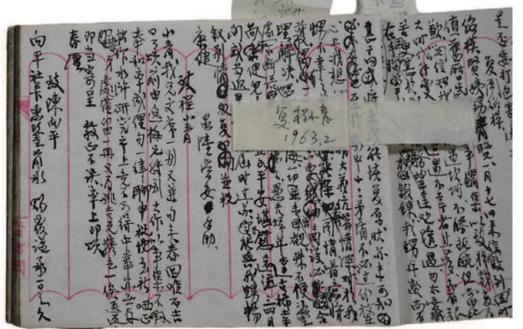
两位侦探小说家的半世纪友情

——从陆澹安赠予程小青的《小说词语汇释》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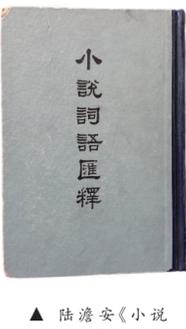
■ 战玉冰

陆澹安(1894—1980)早年以传统文人底色融入上海中西融合的都市文化,创报纸杂志、写侦探小说、开电影公司、改编译弹、办学教书。中年后转向治学,于古典文学、金石碑版、戏曲传奇均有研究。

近日,“澹远乐安——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献展”在虹口区朱记福艺术馆举行,展览期望通过对陆澹安的新发现和梳理,再现海派文化的嬗变,注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展期至8月25日。



▲ 陆澹安复程小青书信底稿(1963年2月)



▲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



看展去

学林

陈望道的零度修辞

■ 盛若青 祝克懿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建构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学术体系,提出一系列重要概念。学界在修辞情境、题旨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两大分野”上仍有争鸣,对“零度”修辞研究较为薄弱。

《修辞学发凡》提出“修辞以应题旨情境为第一”“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从而将语境中的言语现象确定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修辞的两大分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

所谓积极修辞,指的是具有感受、体验性质的辞格与辞趣。谭永祥提出积极修辞是“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丰富甚至超载的言语现象”,是对陈望道所作定义的进一步理论化。

关于消极修辞,学界多有不同看法。一方面,消极修辞研究如辞律、辞风的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修辞就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其作用总是积极的,故没有消极一说,两大分野的提法并不科学;消极修辞实与规范语法并无二致,没有独特的角度和研究对象,因此,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事实上,从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加以考察,语法与消极修辞存在明显差异,语法除了研究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现象,也研究非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现象。像“喝水”不能说成“水喝”,“看电影”不能说成“喝电影”,在研究此类现象时可完全脱离语境。而消极修辞在“修辞以应题旨情境为第一”的修辞学体系中,恰恰是不能脱离语境的,《修辞学发凡》中关于消极修辞所举出的近30个例句均有完整语境,所涉须为话语文本,即是有力的例证。如《修辞学发凡》第58页举例:

王冕……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儒林外史》第一回)

《修辞学发凡》认为这段话文字中的“他便”二字按照文法论原本也可以放在“把”字之前,但会导致后句“乡下的孩子们”笑的主体用牛车载母亲这件事,隐晦了真意。所以应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放在“戴了高帽”之前。此处陈论述消极修辞不能脱离语境外,也论述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区别。

再如动词的选用,消极修辞注重动词的凝练,以最大程度符合语境的要求,最优化修辞效果。例如:

我的母亲早已迎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宏儿。(《鲁迅故乡》)这个“飞”字,飞出了亲人间的热,飞出了侄儿的活泼可爱劲儿。若将“飞”替换成“跑”,从规范语法的角度来看,句子能够合法成立,但消极修辞效果尽失。这是和规范语法研究对象的第二处差异。

那么,特点迥异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如何在同一个修辞学体系中和谐并存呢?《修辞学发凡》提出以“零度”加以连接。

所谓“零度”并非基于“表达和意义的对立”“修辞和规范的对立”。关于两大分野以何种标准划分,代表性观点如张德明提出其“逻辑基础,就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但这会带来一些理论难题。若据前述积极修辞的定义,不难得

出消极修辞即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缺失的言语现象,如果抽象思维为消极修辞基础的观点成立,会得出抽象思维不具美感的结论。但事实上“抽象思维本身已具备独立的审美功能,因此除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共存的美感具体形态以外,人们还会对某些事物发生完全脱离了形象思维,仅由抽象思维所构成的美感具体形态即纯粹的抽象美感”。

抽象思维存在于审美活动中,会给人以美感感受,这符合“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的观点。因此,抽象思维也可作为积极修辞的基础,这充分说明以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来划分两大分野并不科学。

同理,或可视“零度”为言语现象中美感信息缺失的界限。而对美感信息的判定与分类,可基于连续统理论来论述。兰盖克于认知语法研究中提出“将修辞性语言和直线性语言放在同一个连续统中”;吕叔湘则给予明晰定义:“我们在对有些对分类时并不能都做到二分……总起来看,(这些对)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的分类,即连续统”。在语言研究中,言语中美感信息从负数、缺失到增强乃至丰富甚至超载形成的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分处同一渐变连续统的两个不同方向。

那么,如何判定界限?实际上,正是由于言语中美感信息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加上大量言语现象存在模糊性的一面,在修辞实践中,绝对的“零度”修辞可能很难找出。与颜色、词性的连续统类似,“零度”修辞只是一条大体分界线。

在言语实践中,“零度”的标准是可变的,具有相对性。因个体美学感受的差异,“零度”具有见仁见智的主观性。且美感信息的判定也会随着社会条件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零度”的标准也会随之变化,随着美感信息的逐渐消逝,一些修辞现象会演化成词汇现象,而在具体语境中临时获得美感信息的言语现象可转化为积极修辞现象。

《修辞学发凡》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联系的有机整体,不可偏废。

(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献展”(后文简称“陆澹安纪念展”)上,一封“东方的柯南道尔”程小青写给陆澹安的信札引发了笔者兴趣。这封信写于1964年4月19日,第一段内容如下:

接到惠赐巨册《小说词语汇释》,翻阅之余,既感且佩。兄阅之博,摘录之勤,记忆之强,而涉笔六七载,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用功如此,实为侪辈所望尘莫及。谨领盛意,敢为老友道贺!

从信中可以看出,程小青收到陆澹安赠送的《小说词语汇释》(中华书局,1964年2月一版,陆澹安编著),写信表达道贺与感谢之情。而华斯比兄在“孔子网”淘书时,曾在一家地处苏州的旧书店网店里,见到《小说词语汇释》的作者题签版本,扉页上写着“小青社长兄 正菴陆澹安赠”,落款时间为1964年4月2日,应该就是信中所说的那本书,后来不知何故散落出来。当时陆澹安居上海,程小青住苏州,应是陆澹安4月2日签写,托人将书送给程小青,程小青收到书后,回信表达谢意,一书、一信,前后时间正好对上。而程小青信札第二段写道:“日前鹊兄自沪返,谈及兄近体安善,鼓盆之戚,仍见稍杀”,表明二人的共同好友周瘦鹃当时正好往返于苏州、上海两地,并先后见过陆澹安和程小青,很可能就是那个中间帮忙带书的人。

等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精深的造诣。陆澹安曾为好友程小青写过《戏小青三绝》,诗中多次拿好友名字中的“小青”二字开玩笑——认为“小青”合在一起是“情”字;用“小青”和《白蛇传》中的青蛇(也名小青)作比;或说程小青矍铄之年,再称“小青”,不甚合适等等——透露出二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而此前笔者在“茧庐”中,也曾见到程小青所写的七律一首:

戏与吟秋兄各成嵌苏沪友侣人名诗若干首,抄奉拙作一律
澹秋轩外赏梅花,亚字阑前逸兴赊。
炼句已成安绝唱,修辞正可擅菁华。
凌波小榭春光满,横碧青山好景遐。
洒落襟怀吟侣散,碧云大片送飞霞。

诗下面列“澹安、逸梅、亚光、鍊霞、大可、碧波、小青、襟亚、修梅、吟秋”,即程小青将自己与好友陆澹安、郑逸梅、胡亚光、周鍊霞、朱大可、徐碧波、平襟亚、汤修梅、蒋吟秋等人的名字嵌于诗中,其中陆澹安正藏于“澹秋轩外赏梅花”和“炼句已成安绝唱”两句。二人之间的往还酬酢与相互惦念由此可见一斑。

陆澹安这一时期虽分居苏、沪两地,但书信往来频繁,并且经常相赠自己的著作,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陪伴与交流。

“同好”“同事”与“同道”

展上另一幅程小青与陆澹安的合影,即是1964年5月16日,为庆祝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三位好友的七十寿辰所摄影。而这幅合照正好又呼应了本文开篇所引程小青给陆澹安书信中的内容:“碧弟函告,沪上老友拟为鹊、梅、冷三兄七秩称觞。弟曾征求鹊、桥、吟三兄同意,届时当联袂去沪,共谋欢聚。”程小青信中提到,徐碧波曾写信给程小青,说上海的朋友们打算为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三人都生于1895年)共同庆祝七十大寿,而程小青也回了周瘦鹃、范烟桥、蒋吟秋三位住在苏州的好友的意见,大家决定到时一起去上海欢聚,于是才有了这张合影。

进一步想来,除了同样生于1895年的周瘦鹃、郑逸梅、陶冷月之外,程小青生于1893年,陆澹安生于1894年,这群好友其实都是年龄相当的同时代人。在1962年,也就是程小青七十大寿时,陆澹安也专门写过一首七律为好友祝寿,他在诗中特别称赞了程小青的书画技艺,同时也褒扬了程小青的兴趣爱好——比如对于都市新媒体(报纸、杂志、电影)的积极拥抱,或是对于传统文化(诗词书画)的巨大热情——才构成了他们彼此间成为终生“同好”“同事”乃至“同道”的重要基础。

从1930年代的“星社雅集合影”到1964年5月16日的“七秩大合影”,两幅跨越三十年的照片,见证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友谊长存。而从更早在《侦探世界》杂志一起共事,到晚年虽分居两地却书信往来、诗歌唱和不断,借着“陆澹安纪念展”中展出的信札、照片与诗歌手稿,我们能看到陆澹安与程小青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深厚友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积极拥抱新兴事物

谈及程小青与陆澹安的交往,更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侦探世界》杂志创办时期。当时二人同为该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应该有着不少工作方面的合作和交流。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在中国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自不必多说,陆澹安在《侦探世界》第四期的“辑余数墨”(类似于今天的“编辑手记”)中就称“程小青是中国的侦探小说大家”。而实际上,陆澹安自己创作的“李飞探案”系列也是民国侦探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郑逸梅就推荐过当时最著名的三个本土侦探小说系列:“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的,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号。”

除侦探小说外,程、陆二人的另一共同爱好就是电影。程小青不仅亲自操刀将自己的《江南燕》等多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还投资开办过苏州第一家电影院。陆澹安更可謂“超级影迷”,从《澹庵日记》中我们能看到他年轻时大量看电影的相关记录,同时他还将《老虎党》《红手套》等多部外国侦探电影改写成“电影小说”并出版。陆澹安还曾兼任电影编剧、中华电影学校教务主任等职,后来甚至和友人合办过一家新华电影公司。

传统文人的往还酬酢

程小青与陆澹安在当时不仅热衷于侦探小说与电影等新兴都市文化,将“白相”娱乐和工作事业有机统一起来,二人还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可谓志趣相投。如二人同为苏州“星社”成员,范烟桥排印的《星社社友录》中,程、陆的名字都赫然在列。1930年代的“星社雅集合影”,也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程小青与陆澹安“同框”的照片。

“星社”成立于1922年,既包含了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群落的大部分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通俗文学社团之一;也带有传统文人雅集的性质,丁慕琴、谢闲鸥、朱其石、陶冷月、钱瘦铁等书画名家也都是“星社”成员。就在程、陆二人中,程小青能书画,晚年还写过一本《苏州园林》诗词稿,陆澹安对于书法、诗词、弹词、金石碑版、古典小说

珍贵的书信“底稿”

收集和阅读名人信札,恼人的地方经常在于我们只能看到来信,而看不到回信,因为这一来一往两封信一般并不在一处,而是分别保留在收信双方的手中。但此次陆澹安纪念展上,在呈现陆澹安与友人的书信往来时,却经常成对予以展示。据陆澹安长孙陆康先生介绍,陆澹安有抄录信札留底的习惯。这就为我们这些后来读者提供了一个看到完整书信交往过程的机会。如此次展上就有一封陆澹安写给程小青的书信底稿,时间是1963年2月,内容如下:

小青我兄文席:
一别又兼旬矣,春回唯百吉是颂。前由逸梅兄转到大作,以事集不暇奉和,率成俚句一律,聊申祝忱,至祈哂正。拙作《水浒研究》市上竟不可得,中华亦无存书,弟处仅留一册,又为姚吉光携去,一俟送还,即当寄呈教正不悞。率上,即颂
春厘

通过这封信我们了解到,程小青当时刚刚通过郑逸梅送给陆澹安一些诗作,陆澹安也写诗唱和。同时程小青还向陆澹安求一套《水浒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陆澹安著,署名“何心”),但陆澹安手边一时也没有存书,要等姚吉光还书之后才能再送给程小青。而这里提到的姚吉光是沪上著名漫画家,曾参与创办《福尔摩斯》小报。

虽然陆澹安的这封“去信”和本文开篇所引程小青的“来信”并非同一时间的往来,但从这两封都写于1960年代的信中不难看出,程小青与

“自我心理学”之父阿德勒应该不会料到,自己过世八十多年之后,在地球另一边突然火了起来。近年来,随着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的著作《被讨厌的勇气》中译本一纸风行,人们发现原来阿德勒是与弗洛伊德、荣格齐名的心理学巨匠,也发现原来在理解人类行为方面,除了弗洛伊德的因素论,还有阿德勒的目的论。

打个不严谨的比方来解释两者区别。比如一个人患有“社恐”(临床上称为社交焦虑症),从因果论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此人早年经历了太多否定,对自己不够自信导致;而从目的论视角来看,这是他基于自身需要的选择,是为了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受伤害,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前者认为当前的状态是之前经历的必然结果,这是因果论;后者认为当前状态由想要达成的目的决定,这是目的论。

其实在心理学领域,因果论和目的论的分野并非新鲜事。在历史上第一本解释心理现象的著作《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万物皆有一种“实现自我完善目的”的活力,他称之为“隐德莱希”。按照这一观点,人的行为自然是被自我完善的目的所牵引。之后,西方世界对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年的“冰河期”,当人们再次关注并深入探究心理现象的根本原因,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此时,一改两千多年前的传统,目的论已成明日黄花,而因果论占据了心理认识的主流。

如果放在历史的脉络中来看,这一趋势不难理解。基督教文明一路从中世纪走出来,人们很容易将目的论与宗教的僵化束缚联系在一起,视之为愚昧而沉重的枷锁。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正是为了打破这一枷锁,推行科学和理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众多学科都在消解目的论上取得了突破。如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理论宣告“自然是没有目的的”;

“荡秋千”的心理学史

■ 郭晓薇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在心理学领域更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心理学恰恰借实验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母体,跻身于科学大家族。此时的目的论像是令人生厌的旧朝遗老,扼杀了现代心理学年轻活力的形象,需要尽可能地被因果论取而代之。

最为典型的就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取代亚里士多德追求自我完善的活力说。前者认为一切心理问题皆由童年未解决的冲突造成。坊间流传的说法——“好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好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正是心理动力学理论的体现。在他之后,行为主义对目的论进一步赶尽杀绝,将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理解为对刺激—强化构成的条件反射,认为人与人的心理差异完全来自个体从小被强化的历史不同。心理动力学和行为主义构成了现代心理学的第一和第二浪潮,奠定了心理学最初、甚至延续至今的主流基调,总体上都是强调人类被自身过去的经验所塑造和驱动。

有趣的是,认识论的发展如同钟摆,在某个方向发展到极致就产生了回归的倾向。到了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的目的论借第三浪潮——存在—人本主义,出现了回归的迹象。

1958年,作为住院医师从事临床心理工作的年轻人欧文·亚隆体验到了内心的挣扎,自己接受了完整的精神分析训练,但又不完全认同该理论对人消极被动的假设,大学期间研读的存在主义哲学总在向他招手。恰在这时,罗洛·梅的著作

《存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方向》问世,向英语世界介绍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年轻的欧文·亚隆如逢甘霖,致力于将存在主义心理学融入临床实践,最终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存在心理治疗大师。

这是心理学第三浪潮中的一股洪流。第三浪潮通过彰显一个被世人忽视的事实回应了前两个浪潮:人是有自由意志和价值追求的存在,而不是过往经历的被动产物。比如,在欧文·亚隆看来,心理问题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人无法通过寻找意义感、无法利用选择的自由来超越死亡焦虑。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即是要帮助来访者寻找意义和目的,促使他认识到自己此刻的自由,鼓励他使用此刻的自由创造下一刻的意义。

“责任”“选择”“自由”“意义”构成了存在—人本主义的标签。仅从字面上也可判断,这一流派把前心理学界苦心经营的目的论又请了回来。这个过程耐人寻味。当年轻的亚隆探索存在主义心理学时,“心理治疗词典中哪里有这类词条呢?……当我检索此类文献时,医学图书馆的计算机会发出吃吃的笑声”。不过正如他所说,这一取向“陌生却又似曾相识”可能冒犯了我们现代主义的自豪感……但从另一角度看,那些最智慧、最有思想的人们已经开辟出一条悠长的道路,我们可以安心沿着这条道路回到过去。

存在—人本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建构理论进一步靠近目的论。该理论认为不存在客观、独立、真实的“事实”,所谓“事实”是个体基于自己

的体验和观察建构出来的,因此存在个体间的差异。已有大量实验表明,人的记忆并非存在保险箱里的物品那般前进和取出都是一回事。记忆会随着新体验的加入而被再加工、被改写,所以“那些记忆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因果论的基础:既然回忆可能是带着滤镜建构出来的,还谈什么它对后来的影响呢?相反,甚至可以怀疑,是现在的经历影响了回忆内容。既然如此,过去的经历不再是牢不可破的魔咒,人们可以选择用积极、有意义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的过去,更加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

这并不是盲目乐观的想象。21世纪认知神经科学对“默认网络”(default network)的发现,为人的自我建构提供了解剖学证据。美国神经科学家赖希勒发现,人脑处于静息状态时,由多个脑区共同构成的默认模式会被激活。此时,大脑主要被想象性的模拟所占据,包括对过去的理解和叙事,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和展望。如果大脑的默认状态是想象性的模拟,这意味着,在预测和理解人类行为方面,未来展望取向比过去驱动取向更为有效。

沿着历史的脉络,从前现代、现代再到后现代一路走来,可以看到心理学家对心理现象的认识是在目的论和因果论之间荡秋千,或者说,是在两者间螺旋上升。不过这只是在“大颗粒度”地回顾心理学史,其实从微观上看,每一个时代都并存因果论和目的论两种声音,每一种声音会被选择和传播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语境,无所谓谁更先进。正像阿德勒的目的论近年来才被中国的心理学爱好者关注和欣赏,人们很难想到他竟与弗洛伊德是同时代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倡导多元并存,在对人的认识上,因果论和目的论都有各自发挥解释力的语境。它们如同阴阳两极,看似对立,实则互补而一体。(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